

中卷

王炳华 著

东北古族古国 古文化研究

DONGBEIGUZHUGUOGUOWENHUYANJI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6.3274083
W282
0037117

中卷

王锦厚 著

东北古族古国

古文化研究

DONGBEIGUZUGUOGUOWENHUYANJIU



00371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中卷) / 王绵厚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8

ISBN 7-5316-3748-0

I. 东... II. 王... III. 地方史-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古代 IV. 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2956 号

**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中 卷)**

DONGBEI GUZUGUGUOGUWENHUA YANJIU

王绵厚 著

责任编辑: 张天栋 刘剑刚

封面设计: 孙少江

责任校对: 文 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0.75·字数 255 千

2000 年 8 月第 1 版·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

ISBN 7-5316-3748-0/K·91 定价: 51.00 元 (上、中、下卷)

2000.12.5

王府井书店

No. 0082191

目 录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辐射·····	(1)
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	
——兼论大石棚积石墓石棺墓文化的族属与时代·····	(11)
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	(30)
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	
——兼论“屠何”方国·····	(44)
考古学所见两汉之际辽西郡县的废迁和边塞的内徙·····	(55)
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	(68)
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	(88)
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其社会发展的关系略论·····	(120)
高句丽古城的构筑特点及其特殊规律·····	(137)
高句丽古城的建置分期及其历史背景·····	(162)
高句丽古城址出土文物的考古学断代分析·····	(178)
关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三城一宫”的地理考证·····	(201)
高句丽“辽东城冢”壁画中若干问题的考析·····	(217)
新城、南苏、木底道与高句丽的南北二道·····	(227)
隋与唐初粟末靺鞨的南迁及其驻地考·····	(239)
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	(250)

辽金元懿州豪州建置考

——兼论元代“洪州”地名之来源…………… (263)

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

——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 (275)

明彩绘《九边图》研究…………… (285)

辽海地区世存古代印玺概论

——《辽海印信图录》前言…………… (297)

《大元混一方輿胜览》辽阳行省地理疏证 …… (305)

关东珍铭 金石瑰宝

——《辽宁省博物馆藏历代碑志精萃》概说…………… (322)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 的形成及其辐射

地跨白山黑水和松江辽土之间的中国东北地区，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是东北亚大陆古代文明孕育和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代考古发现和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在这一广袤的东北亚腹地古代文明形成发育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有一条以共同的人文经济地理条件和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以诸民族交相汇融的文化内涵为纽带，跨越民族和国家区域界限的稳定的文化链条，这就是被称为“汉文化圈”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千百年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亚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博大的蕴藏力，已为世人所共识。关于这一地区“汉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更是中外学术界热心关注并有许多未解之端的重要课题。缀于《秦汉东北史》卷首的这篇短文，试图对数千年来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辐射进行扼要的历史考察。

一、“多源一体”的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历史阶段

追溯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历史，应当首先界定“汉

文化圈”形成的上、下限。当代考古发现证明，如果把中国大地上华夏文化的形成初期当作“汉文化圈”的孕育期，则东北地区汉文化圈的形成应与中原同步，当开始于新石器时代。近年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地证实，在中国东北经过长期孕育，这种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应以 5 000 年前至 6 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为典型代表。包括先“红山文化”的辽西查海类型和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由于本篇不是专门的考古学论文，无庸对红山诸文化作类型学的分析和分期，只须从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存中，披见这种东北地区早期华夏文化（汉文化）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是一个“多源一体”的过程。这种多源一体的“多源性”，反映了北方（包括东北亚）文化的区域特点，即以石质葬具和巨大的祭祀遗址为标志；以之字纹筒形陶器及其陶艺装饰为特点；以农牧兼渔猎为主的经济手段的北方原始文化传统。这种多源一体的“一体”性，则集中反映在以巨形石犁、石斧为工具的农耕技术；以早期玉制品为代表的原始工艺技术，以对祖妣女性和大地母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意识；以及遗址中以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礼形式。特别是对“龙”的崇尚和金属冶炼的出现，无一不凝聚着早期华夏文明的精髓。这一切使“红山文化”迥然有别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化，而与五六千年以前的中原华夏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多源一体”的趋势。有的学者把 5 000 年前“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女神”像，推衍为“女娲”的祖型，提出先商北源说。如果这种见解具有卓识，那么，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史前文化，恰应是华夏文化在东北形成“汉文化圈”的奠基时期之母体文化。她为进入国家形成以后的“方国”时期“汉文化圈”在东北地区的拓展和传播，准备了先决条件。以上所述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完成的“古国”到“方国”的过渡，大体可以划作中国东

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前期。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后期，即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上综合考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以公元前 11 世纪前后，商末周初箕子入辽东、适朝鲜为代表的汉文化向东北南部辽海渤海之间的集中传入期，即“方国”的形成期。《尚书》等记述此时期约始于公元前 1054 年至 1043 年间。

其二，以战国末燕昭王时秦开却胡设立五郡为标志，汉文化向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传布期和建置形成期，即东北的建置初创期。

其三，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在东北的确立期，即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和边域的广泛深入传布期，亦即郡县确立期。

这后期第一个阶段，所以以商周之际箕子入辽为标志，不仅因为这是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殷周遗民集中迁居东北，并为东北夷的“荒服”之地带来了“礼、乐、田、蚕、织作”之教；而且正是在中原周初分封制度影响下，东北地区部族方国的正式形成和诸部族文化频繁交往时期。周武王灭商在客观上使殷族遗民北迁东渡，与山戎、北狄、东胡、秽貊等民族杂处，为汉文化第一次广泛的北传东渐，提供了历史契机。这次广泛的汉文化圈的北进东传，其影响所致，绝不限于一代人和少数边夷之地，事实证明，其至少影响到从西周到汉初的近千余年。箕子东迁，在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华夏移民在东北亚从“方国”的形成到郡县制出现前，从民族的“古国”步入分封制的“方国”之奠基期。

第二阶段，以燕昭王时秦开却胡设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渔阳五郡为标志，是汉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深入传播和建置

发展时期。广为学者引证的《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燕将秦开却胡设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这是自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经过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列国争霸到趋于统一的前夜。秦开却胡设郡，表面上是以国家武力的形式对边郡的开拓，其实质是燕国自周初对北方数百年的经营，汉文化在北方潜在影响的必然结果。考古勘察证明，在东北南部遗存的燕、秦、汉长城，横亘于北纬 $41^{\circ}20'$ 至 $40'$ 的东西横线上，长城内外留下的大量燕秦汉文物，诸如带有秦统一诏版的陶量、铁权，统一的货币、量器和战国兵器等，无一不是汉文化北渐的标识。古老的燕秦长城，与其说是当时北方民族区域间的军事障塞线，不如说是秦、汉统一以前，汉文化北渐的界标和南部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一条文化分界线。然而，汉文化在先秦时向东北的传播，并不是以长城为终界。相反，历史发展证明，作为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衔接地带的文化载体和前沿阵地，燕秦长城，只是中原列国企图保护“汉文化圈”腹地的一道藩篱。

第三阶段，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圈”在东北的确立时期。《汉书·匈奴列传》记载：“至孝武皇帝……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列起营塞。”同书《夏侯胜传》亦记，孝武皇帝“东定秽、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

汉武帝时期开边设郡，率服边夷，是对燕秦拓边向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所谓以玄菟、乐浪为郡，是指在燕、秦于东北设五郡的基础上，汉武帝于滨海之地的“沃沮”设玄菟郡；又于大同江流域设乐浪郡，从而把燕秦的东北郡县区域，从松辽南部之

地，拓展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海沿岸，奠定了中古以前，中国东北民族疆域的基础。在汉武帝拓边设郡的广阔的东北边腹地区，随着封建郡县制的确立和完善，自秦汉以来“车同轨、书同文”的政令和汉廷的典章礼俗，已北逾长城而深入到九夷之地和边隅海角。从而在大部分东北亚地区，最终形成了总体的“汉文化圈”。当代考古发现，渤海沿岸辽西秦汉“碣石宫”之规模和气势，甚至可直比阿房宫。证明了秦汉之际，在汉文化的传布下，东北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方国”向“帝国”的转变。

二、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诸阶段的历史标志

上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东北“汉文化圈”，从其几千年发展的轨迹看，的确是一个从“多源一体”到“多源一统”的过程。其发展的每一步，都犹如一条浩瀚的江河，总是在不同阶段汇集和容纳了诸多源头的支流，而汇合为“汉文化圈”的巨川。这种融汇各族文化而形成的“多源一体”的东北汉文化，决定了东北古代“汉文化圈”的内涵比其它任何地区的民族文化更带有“一体多元”的性质：即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兼容并括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为多元的综合性民族文化。这种“一体多元”的东北古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始终是具有勃勃生机和广泛内涵的民族文化。尽管在疏于历史记载的典籍中鲜于记述，但能够从当代考古发现中进行综合考察。

如前所述，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前期标志应集中反映在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国”时期。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使辽河流域处于“汉文化圈”形成启蒙阶段的先导地位，即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原生型”。继此以后，在东北汉文化圈形成后期的

第一阶段商周之际，汉文化圈形成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具有汉文化主体因素的诸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其中东胡、肃慎和秽貊，是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形成的最大的三个民族共同体。她们当中又因为东胡和秽貊毗邻燕、赵，靠近中原，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形成了东北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融合的文化交叉地带或桥梁地带。被学术界公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以后的东胡系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汉文化因素，已为学界反复证明，自不待言。即使是地处松花江流域属于秽貊或夫余先世的“西团山文化”，以三足陶器、锄耕农业、城邑建筑和竖穴土坑木椁或石椁墓等为代表，也显示出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说明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在商周时代，已具有广阔的覆盖面。

进入第三阶段的战国燕秦和西汉前期，“汉文化圈”在东北广阔腹地和边郡形成的标志则更加显著。除辽河流域外，还发现了松花江中游吉、长地区的“汉陶”文化，至战国前后，普遍发现了以轮制和模制泥质灰褐陶为特征，器表饰弦纹、绳纹、堆纹，以罐、瓮、盆、钵、甗为组合的中原陶器群体，晚期又有中原类型的铁镬、锛、斧、镰等农具发现，反映了这一秽貊地区汉文化传布的强烈影响。由考古发现上看，从战国燕秦拓边设郡，到汉武帝“复修辽东故塞”的一个多世纪中，在东北南部燕秦汉长城内外的广阔区域，更普遍发现了按汉制设立的郡县及守备城堡，夯筑城郭和烽、燧、亭、障遗址，遍及长城以南腹地；至此战国中期以前，西部的山戎、“东胡”遗存和东部的秽貊系统的石棺墓和素面粗褐陶文化到汉初时基本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土坑竖穴墓和土坑木椁墓；战国以前的夹砂粗褐陶代表的少数民族器皿，逐渐被质坚、胎纯的高火度汉陶代替；在大部分东北腹地，以“液体还原法”冶铸的铁器，也逐渐代替了铜器、大部分石器

和骨器。此外，随着秦的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已经普及到东北边域各郡县，甚至在大同江流域的汉初“沃沮”和“乐浪”地区，也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前后西汉前期“天祖涉君”银印和“乐浪太守”等封印，其印制、文字和职官制度，均一统汉制、宛同内郡。这一切证明，从战国末到汉武帝以前的近百年中，“汉文化圈”在东北的确立，不仅反映在建置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中，也深刻地反映在典章礼俗和文化意识领域，从而标明到公元前1世纪~2世纪的西汉初期，“汉文化圈”在东北地区已经在总体上达到了确立时期。这是从箕子东迁的“方国”期，发展到辽东汉郡确立的“帝国”期的全过程。它与中原的从奴隶制的“分封制”到封建的“郡县制”的发展相同步，反映了“汉文化圈”在中国东北包括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海西岸，经过千年发展，已被诸民族所认同。这以后，尽管在广阔的东北边区，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附属于中央王朝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民族政权，诸如汉魏晋时期的高句丽、夫余；东晋时前燕、后燕、北燕政权；唐代的渤海国和两宋的辽、金政权，但在文化总体上已统属于“汉文化圈”的范畴。他们立国建邦的政治、经济基础，诸如典章、文字、建置、税法、礼俗和官制等，无一不与汉中央政权的政治模式和儒家文化的体系一脉相承。

三、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过程中 向周边的辐射及其影响

如上所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孕育和发展，至商周之际开始大规模向东北传布的“汉文化圈”，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和传播，融合了北方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在战国和汉初之际，已经在环

黄、渤海和松辽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根基。随着汉文化圈在东北的形成和发展，它向四周的辐射和蔓延也与日俱增，使其成为公元前 2000 年至 3000 年间，东北亚核心地区的主体文化。从汉文化的历史传布方向和考古学的区域类型学分析，秦汉和秦汉以前东北“汉文化圈”向周边的辐射，主要有如下三个方向：

1. 由辽河流域向朝鲜半岛横向传播。辽东与朝鲜半岛间的天然地理纽带，使其成为汉文化直接东渐的陆桥。早在商周之际，箕子入朝并在大同江流域建立最早的古“朝鲜国”，即战国以后的“乐浪郡”地，已为学者共识。《尚书·禹贡》中所谓，“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指的就是先秦时由朝鲜半岛和辽东通向黄河流域的人文地理交通。从当代考古发现看，先秦时辽东和朝鲜半岛文化已一脉相承。诸如以青铜时代的大石棚、石棺墓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在两半岛间几乎难以区别，其时代的早晚序列，则由辽东至朝鲜半岛依次由北而南发展。其他如种植粟类和以石制工具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从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上也呈由西而东序列发展。诚如朝鲜学者在著作中写道：“朝鲜半岛的农耕，作为旱地农业开始有纹陶器时代对粟的栽培，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早期农耕有着很深厚的关系……一进入无纹陶时代，种植多种谷物的旱地农业便兴盛起来了，并且水稻的种植也是这一时代兴起的。”

朝鲜半岛的“有纹陶时代”，相当于中国东北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其文化的流向，已如朝鲜学者论述的那样源流分明。而所谓“无纹陶时代”，相当于中国东北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辽东半岛的近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 4 000 年前，已有稻作农业出现，而旱地农业粟和高粱的发现，更遍及东北南部。这说明以粟、高粱的种植和稻作栽培为标志的农耕文化，早在数千年前已由东北传向朝鲜半岛，并由朝鲜海峡渐次传向日本海两岸。至于

有文字记载以后，由“辽东郡”经“乐浪郡”，再经“三韩”之地，通向日本的文化之道，已屡见于汉、魏史籍，早为世人公认，不待赘论。

2. 在东北腹地秦汉长城以北的汉文化，沿松花江顺流向其中、下游的秽貊、夫余，及其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传布。这一条传播路线，文献中记载较少。但以“西团山文化”为代表的遗存中，已明显看到以三足陶器、汉式墓葬结构和以夯筑土城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进入汉初以后，夫余、高句丽等臣服于汉廷，典章、礼制一同汉制。至东汉时，远在日本海西岸的今图们江口吉林省珲春一带的“沃沮”故地，已有船队渡海直通日本，汉文化直接从中国东北的“玄菟郡”、“乐浪郡”等腹地传输至朝鲜“三韩”之地和日本，从而使传统的汉文化直接传入日本海东岸，进而使汉文化成为覆盖东北亚纵深区域的名符其实的东亚文化。

3. 东北早期“汉文化圈”向北方草原地区的传布方向，则始终沿着燕山北麓的草原之道，通向蒙古草原和黑龙江上游及其以北地区。从商周的山戎、北狄，到春秋战国以后的东胡、匈奴和鲜卑等，他们的文化在兴衰嬗变中，无一不吸取了汉文化的主体因素。有着广阔覆盖面的著名的“夏家店文化下层文化”，多数学者将其族属归于“先商文化”或“先燕文化”，其文化内涵中的汉文化因素则是论者共识的。其中包括以绳纹和篦点为主要装饰的三足灰陶器；以磨制石铲、石刀和打制石锄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定居农业；以半地穴式居室和夯土墙、土坯、石筑城垣等构成的建筑设施和金属冶炼及卜骨的使用等。这一分布于燕山以北至西拉木伦河南北的早期青铜文化，不仅融汇了前期新石器时代华夏文明的诸多因素，而且影响着北方草原地带诸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后的东胡文化、匈奴文化和鲜卑文化，尽管各有其

民族特色，但其文化内涵在主体中，一直贯穿着汉文化的脉系。东北和长城以南的汉文化，在进入秦汉以后，则以官方“驰道”和驿站的形式，穿过燕山山脉和大漠草原，直接进入匈奴左部乃至“龙庭”故地。汉以后，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北方诸民族的文化在长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尽管遭到许多外力（包括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破坏，但始终前后承接并延续发展，其历史的基因，正是因为融入了汉文化的主体内涵，并一直成为“多源一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不竭之源。

总之，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从客观历史发展和宏观时空的角度看，至秦汉以前，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共五个阶段。前期应以“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两个阶段；后期则从商周之际至汉武帝以前，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商末周初箕子入辽东、燕将秦开却胡设郡和汉武帝拓边设置郡县。其前后共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历史。这一过程，正是汉文化在东北亚的腹地“多源一体”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由公元前1世纪~3世纪即战国末至西汉初始告完成，并继续向纵深发展。上述“汉文化圈”在中国东北形成发展的漫长过程，正是本书《秦汉东北史》的序章。它既是中国东北史研究的龙头；又是开启东北亚史研究闸门的锁钥。《秦汉东北史》所记述的，正是承接“汉文化圈”在东北的确立之后，从秦汉立国到西晋统一前近500年间，以汉族为主体，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诸民族的共同历史。

（原载《东北亚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 考古学文化的考察

——兼论大石棚积石墓石棺墓文化的族属与时代

早在战国和汉以前已屡见于文献中的秽与貊，是古代东北地区的重要少数民族。但关于秽貊族系的历史渊源和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却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然而仍存在着许多未解之端的东北亚历史考古中的重大课题。这篇短文拟对历年来以辽东为中心，包括吉南和鸭绿江两岸广泛发现的大石棚、积石墓与石棺墓文化的考古学性质及其族属问题，通过与文献印证的类型学分析，提出作者的拙见。希望得到专家和同仁的指疵，以便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对文献中关于汉和汉以前辽东貊族记载的分析

貊又作“貉”，同秽族一样，是古代“辽东”（含东北南部乃至朝鲜半岛北部）的一支古老部族。先秦文献中关于“貊”族的记载举其要者有：

《诗经·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

《周礼·秋官·司寇》：“夷隶百有二十人，貉隶百有二十人”。

东汉郑玄注：“（貉）征东北夷所获”。

《大戴礼记·礼察》篇：“汤武置天下於仁义礼乐……广育被蛮貊四夷”。

《管子·小匡》篇：“（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

《孟子·告子》篇：“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

《战国策·秦策》：“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

《山海经·海内西经》：“貉国，在汉水东北。地近於燕，灭之”。

《荀子·强国》篇：“秦……北与胡貉为邻”。

以上列举的先秦文献八种，多单称“貉”（貉）或“蛮貉”、“胡貉”等。在汉代以后史书中关于貉的记载，则多为“秽貉”连称。如：

《史记·货殖列传》：“燕……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①。

《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②。

《汉书·高帝纪》：（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橐驼助汉”^③。

《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④。

《汉书·食货志》：“彭吴穿秽貉、朝鲜，置沧海都”^⑤。

《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句丽，一名貉耳。有别种以小水为居，因名小水貉。出好弓，所谓貉弓是也”。同书注引《魏氏春秋》曰：“辽东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因名之曰小水貉”^⑥。